

工作动态

中心召开学期工作会议

2002年1月23日，本中心召开学期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主持，中心的全体专职研究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2001年度工作的总结，二是2002年度工作的部署。

方一新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近期加盟本中心的两位新成员：去年12月刚从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的姚永铭博士和2001年暑假毕业的史光辉博士。方教授表示，新成员的到来为汉语史研究中心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今后中心仍将继续引进优秀人才，为中心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对于过去的2001年，方一新教授总结说，去年是中心成立以来最初也是最关键的一年，在教育部和学校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汉语史研究中心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网站建设等各方面工作进展顺利，运行态势良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有理由相信，2002年中心的各项工作会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对今年中心要做的工作，方教授也作了介绍，特别提出以下几项重点要做的工作：一是重大项目的申报，今年两个重大项目是由黄金贵教授和黄笑山教授分别牵头的《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词典》和《唐五代韵书汇纂》，希望两位负责人尽早准备，做好课题组的力量组织和项目论证工作。二是中心内部个人项目的启动，经过中心讨论决定，中心专职成员的个人项目已经确定，研究经费将分批拨付，希望申请到个人项目的中心成员要认真对待，结项的最终成果应为学术专著。三是今年五月将召开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纪念会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诞辰100周年。姜亮夫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敦煌学家，他在汉语史、敦煌学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享誉海内外。蒋礼鸿先生和郭在贻先生也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语言学家和敦煌学家。为了缅怀姜亮夫先生及蒋礼鸿、郭在贻教授的学术成就，弘扬他们献身学术的精神，并展望新世纪汉语史、敦煌学研究的发展，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管理办法》的精神，

中心拟于 2002 年 5 月 24 日在杭州召开纪念姜亮夫先生诞辰 100 周年暨缅怀蒋礼鸿、郭在贻教授学术成就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将举行《姜亮夫全集》、《蒋礼鸿集》、《郭在贻文集》出版座谈会。方一新教授提出，去年的第二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得到了与会者的很高评价，今年应该再接再厉，力争办得更好。

中心副主任王云路教授通报了中心学术刊物名称、人员调整和郭在贻先生文集的编纂情况，她介绍说，为了使刊物的容量更大，和中心的名称相一致，经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决定把中心的学术刊物《中古近代汉语》更名为《汉语史学报》，刊物的顾问和编委有所增加：增补香港的丁邦新、日本的平山久雄、挪威的何莫邪三位著名学者为顾问，美国的孙朝奋、冯胜利两位先生为编委，以增强中心在海外的影响，促进汉语史研究中心和海外的学术交流。另外，为配合今年五月份的国际会议，蒋礼鸿先生的文集已经正式出版，姜亮夫先生全集正在陆续推出，郭在贻先生的文集正在紧锣密鼓地整理校对当中，预计会在五月份会议之前正式出版。

中心办公室楼笑笑向中心成员通报了 2001 年度中心经费的收支情况。

最后，中心成员就中心的一些日常工作如经费报销、网站维护、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工作展开讨论，充分发表了意见。

武汉大学基地办主任参观本中心

4 月 5 日，武汉大学人文社科处基地办公室主任谭玉敏一行三人在我校人文社科部褚超孚副部长和蒋帆同志的陪同下参观了汉语史研究中心，和中心负责人方一新、张涌泉教授、办公室楼笑笑等进行了基地建设方面的经验交流。谭主任介绍说，武汉大学共有六个教育部直属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保证基地顺利运行，学校设立一个管理基地的专门机构——文科基地办公室，其主要职责是服务与协调：尽可能地为基地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协调好基地与学校各部门以及上级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向他们介绍了汉语史研究中心的有关情况，同时双方就目前基地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难点如兼职教授驻所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谭玉敏主任一行还参观了中心的学术报告厅、成果陈列室以及资料中心。

学术交流

张涌泉教授参加青年语言学家论坛

2002年1月17日至18日，商务印书馆在京举行“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发布会暨青年语言学家论坛”。商务印书馆决定出资100万元，设立语言学出版基金，用于资助语言学著作的出版。张涌泉教授应邀参加会议，并作了“大力加强近代汉字研究”的报告。

王云路、池昌海赴香港参加

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

汉语史研究中心王云路教授、池昌海副教授应香港大学单周尧教授和陆镜光教授的邀请，参加了3月12日至14日由香港大学中文系和语言学系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语言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王云路教授和池昌海副教授分别作了大会发言。王云路发言的题目是：《试论外族文化对中古汉语词汇的影响》，池昌海发言的题目是：《大陆二十年征婚启事语言应用变化分析》。

王云路教授应邀访问香港科技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王云路教授应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著名语言学家丁邦新教授的邀请，于3月14日至16日参观访问了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与丁邦新教授等座谈讨论了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与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展开合作研究的诸多问题，包括五月份丁先生率团参加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召开的中古汉语与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五场学术讲座的具体事宜；双方定期互派研究人员进行短期交流；共同主办学术刊物；共同建设汉语语料库等，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王云路还参观了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等。

方一新教授赴日本访问

2002年2月15日至3月31日，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应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学长（校长）广部雅昭先生之邀，赴日本静冈县立大学作研究工作，并分别和静冈县立大学学长广部雅昭、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长矢野正一以及合作教授、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的嵯峨隆教授进行了友好座谈，向日本学者介绍了中国汉语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以及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

访日期间，方一新教授先后访问了东京大学、神奈川大学（横滨市）、创价大学（八王子市）、东京都立大学（八王子市）等几所大学，和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平山久雄先生、大西克也先生，创价大学国际佛教研究所的辛岛静志先生、文学部的水谷诚先生，东京都立大学的佐藤进先生、小方伴子女士、松江崇先生见面，交流中日两国汉语史研究的有关情况，日本学者向方教授赠送了他们的研究论著；方一新还参观了这几所大学的图书馆、文学部、中文系的图书室，查阅了有关的研究资料。

应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部之邀，3月7日上午，方一新教授在神奈川大学作了《六朝时期的汉语词汇》的学术讲演，讲演结束后，还和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部的先生们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在望月真澄教授陪同下，参观了江户时代的名城镰仓。

3月23和27日，方一新教授还分别和京都花园大学的衣川贤次先生、名古屋南山大学的梁晓虹先生在静冈和名古屋市见面，进行了学术交流。在名古屋访问期间，游览了名（古屋）城公园和知多半岛。

方一新教授已经于3月31日回国。他对日本良好的生活环境、全国各大学及研究机构联网的电脑检索手段和丰硕的研究成果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本中心陈东辉副教授从日本回国

本中心副教授陈东辉博士从1999年4月起，应聘为日本国立福井大学外籍教师，赴日讲学三年，于今年3月30日回国。在日期间，他从事汉语、中国文化及中日文化交流史等方面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还面向全校师生和广大市民开设过“中文工具书

使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等专题讲座。此外，他还曾赴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参加日本中国学会等单位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向他们介绍了汉语史研究中心的概况，扩大了中心在日本的影响。

在日期间，陈东辉副教授还从事日本汉学及中日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部分成果已经在日本、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有关刊物上刊发，另有部分成果收入他的论文集《古典文献学论考》（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2002年5月出版）

美国华盛顿大学余霭芹教授来本中心讲学

2002年3月27日上午，著名语言学专家、美国华盛顿大学余霭芹教授访问本中心，并为本中心师生作了题为《尚书 的定中结构》的学术报告。余教授利用甲骨文和金文考察汉语的定中结构，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中心语+定语类型”；无标志“定语+中心语”类型；以“之”字为标志的“定语+之+中心语”类型。第一种出现得最早，仍残留在甲骨文和殷、西周的金文中。第二种盛行于殷、西周时代。第三种始见于春秋战国时代。在此基础上，余教授根据定中结构在历史上的演变发展情况，对《尚书》不同篇章的年代进行了鉴别。

报告结束后，中心师生踊跃提问，与余教授就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潘悟云教授、朱晓农博士访问本中心

2002年4月1日下午，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潘悟云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助理教授朱晓农博士来本中心座谈，介绍经验。

座谈会由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主持。朱晓农博士先介绍了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在著名语言学家丁邦新先生的领导下在语言学方面已做和将要进行的工作以及

取得的不俗成绩。潘悟云教授着重就语料库建设的问题通报了有关情况。潘教授认为要推动语言学的发展，数字化迫在眉睫，因此计划建设一个面向海内外学术界的语言研究的大数据库。该计划下设筹划组和执行组。筹划组由德高望重的著名语言学家组成，有大陆的江蓝生、沈家煊、陆俭明、孙宏开、詹伯慧、鲁国尧、张斌、戴庆厦、李如龙等，美国的王士元、郑锦全、梅祖麟，台湾的李壬癸、龚煌城，香港的丁邦新，主要负责筹集资金，作规划和协调工作；执行组负责具体工作，召集人有潘悟云、何大安、张洪年。数据库计划分四大块：汉语方言；民族语言；文献；句法学。其中文献部分与中心关系最为密切，因此也成为潘教授介绍的重点。中心副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张涌泉教授介绍了《敦煌文献合集》、《敦煌文献语言大典》的工作进展情况。潘教授还与中心成员就字库、字形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当天晚上，潘悟云教授还作了题为《呼唤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再次结合》的学术讲座。潘教授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当前上古音研究的进展情况，认为自清代乾嘉学者将音韵学用于训诂学取得重大成果以来，现代音韵学的长足进步已经对上古汉语中的一些语音交替现象等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再次结合有可能促成建立上古汉语形态学。潘教授的讲座涉及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民族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各方面的知识，内容充实生动。报告会气氛热烈，师生们踊跃提问，潘教授旁征博引，精彩作答，给聆听讲座的汉语史专业的师生和前来参加讲座的外校教师很大的启发。

本中心成员与日本所王勇教授及王宝平教授座谈

2002年4月3日，本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副主任张涌泉教授、王云路教授以及黄笑山教授与刚刚从日本学习回来的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勇教授和副所长、汉语史中心兼职教授王宝平进行了座谈交流，双方就相关学科在国际上的发展动态进

行了交流和探讨，在今后进一步加强合作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简讯

本中心三位教授被聘为浙江省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学科组成员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工作会议 2002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在杭州举行。会议讨论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等文件，并举行了浙江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颁奖仪式，本中心方一新教授的著作《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颜洽茂教授的著作《佛教语言阐释》评获著作类二等奖，张涌泉教授的论文《大型字典编纂中与俗字相关的若干问题》评获论文类二等奖。会议还举行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学科组专家的授聘仪式。本中心方一新教授、张涌泉教授、黄笑山教授被聘为语言学学科组成员。方一新教授是继担任我省“九五”规划学科组成员后再次受聘，张涌泉教授还担任语言学学科的副组长。

张涌泉教授“敦煌文献校读释例”课题 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张涌泉教授 1999 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他申报的课题“敦煌文献校读释例”2001 年 12 月被正式批准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教社政司函[2001]210 号），首批拨款 6.5 万元已经到位。

会议消息

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纪念会 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敦煌学研究和汉语史研究是浙江省的传统优势学科，在海内外学术界都有很大的

影响。为这一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老一辈学者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先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姜亮夫的《楚辞通故》、《瀛涯敦煌韵辑》、《敦煌韵书卷子考释》，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义府续貂》，郭在贻的《训诂丛稿》、《训诂学》，等等，都是敦煌学研究和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划时代著作，蜚声海内外。三位先生以他们的杰出成就，确立了浙江省的敦煌学和汉语史研究在国内外的领先地位。在他们的培育和影响下，现在，一批年轻的敦煌学家、语言学家业已成长起来，并以他们的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浙江在敦煌学和汉语史研究领域的传统优势和领先地位，巩固了浙江作为全国公认的敦煌学和汉语史研究中心之一的地位。

抚今追昔，饮水思源。为了缅怀亮夫先生及蒋礼鸿、郭在贻教授的学术成就，弘扬他们献身学术的可贵品质，促进我省语言学、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扩大学术影响，本中心决定在 2002 年五月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召开一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会议计划如下：

一、议名称、时间、地点

名称：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纪念会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时间：2002 年 5 月 23 日至 28 日(5 月 23 日报到；5 月 24 日上午，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纪念会，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全集出版新闻发布会；5 月 24 日下午至 5 月 27 日下午，学术研讨会；5 月 28 日离会。)

二、会议内容

1. 学术讨论：(1) 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学术成就的回顾、学术方法的总结与继承；(2) 21 世纪汉语史、敦煌学研究的展望；(3) 汉语史、敦煌学研究的其他问题。

2. 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纪念会；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全集出版新闻发布会

3. 参观考察

二、会议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协办单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浙江省语言学会、浙江省敦煌学会

三、会议规模：境内正式代表：80人；境外正式代表：20人。

四、会议筹备委员会名单

筹备委员会主任：蒋绍愚

筹备委员会委员：蒋绍愚（北京大学教授）、江蓝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项楚（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所长）、鲁国尧（中国音韵学会会长）、吴金华（复旦大学教授）、柴剑虹（中国敦煌学会秘书长）、蒋冀骋（岳阳师范学院院长）、曾骅（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廖可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方一新（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浙江大学古籍所所长）、王云路（浙江大学古籍所副所长）

联系人：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古籍研究所张涌泉，邮编 310028；电话：0571-88273448
（办）85128251（宅）E-mail：zdzyq@emb.zju.edu.cn

文摘

编者按：郭在贻教授（1939--1989）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训诂学、敦煌学、楚辞学诸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为我校汉语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86年，郭在贻教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他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1988年，郭在贻教授被国家人事部核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为弘扬郭在贻教授献身学术的精神，促进语言学、敦煌学研究的发展，本中心正在编辑多卷本的《郭在贻文集》（将于2002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现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为《郭在贻文集》写的序和张涌泉、王云路、方一新写的前言先行刊登于下。

《郭在贻文集》序

许嘉璐

2002年12月在京举行《孙诒让全集》编纂工作会议，在贻的高足王云路、张涌泉两位教授到会。他们告诉我，在贻的文集已经整理好，希望我能写一篇序。我未加思索当即答应了。早就想写一写我心中的在贻了。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动笔，是因为自他去世，只要一提起他，我就平静不下来。前几年看到刘坚兄一篇饱含感情回忆他的文章后，既觉得我也应该用文字一吐久郁的怀念，以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在语言学这个角落里曾经有过这样一颗璀璨的星，知道一位朴实严肃、成就斐然的学者的另一面，同时又不愿意去碰那正在平复的失去挚友的伤痛，因而至今一个字也没有。

是的，我该写了。但是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往事便泉涌而至，一幕幕快速闪现，清晰而又模糊，以致我多次手抚键盘，竟理不出个头绪。春节将至，张涌泉教授又来信催促，意思是假期里总该稍闲，或许可以交卷了吧。出于对恩师的爱，他这样想，是情理中事；但他毕竟年轻，还不能充分理解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纪念亡友时的心情：我哪里只是因为忙而没有写。但是，我的确该写了。

写什么呢？想来想去，在贻的学术造诣，对训诂学，特别是对俗语词研究的贡献，他继承朴学而又有所发展的治学风格，他纯洁、宽厚、真诚的人品，都为语言学界所共赞，书文具在，读之者自当知之，无须我在这里介绍。想来想去，还是写写往事的几个碎片吧。

我与在贻初识是在1980年1月初。我与郭锡良、赵克勤二兄到杭州大学征求对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意见。杭大中文系为此组织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会上，在贻的话不多，提了些什么意见也早已遗忘。留下的印象是，当时就觉得他温文尔雅，言不虚发，功底很深。会上只说关于《古代汉语》修订的事，未得个别交谈。正遗憾间，晚饭后，在贻却推门进来了。那一晚当然相得甚欢，但当时也没有想到，从此刻

起，我们即成莫逆。或许这就是所谓“缘分”？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知识分子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人人觉得有用不完的精力，更有做不完的事。我们都忙，一南一北，难得见面，平时只能书信往还，匆匆一晤也就显得更为珍贵。那时一想到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被用烂了的诗句就会跳进脑子里。我品出了个中滋味。

1984年，在贻荣获首届吕叔湘基金奖。我为他而高兴，得知他将来京领奖，又是一番欣喜。他在京只待一天，领了奖，就跑到我家来了。他说，这些日子身体不大好，本不想来京的，但是刘坚兄告诉他，吕先生希望他能来，就来了。这次来，哪里也不去，北京的朋友们就托我代为问候。坐了一会儿，他说，咱们出去走走吧。我问去哪儿，他说去琉璃厂，看看有什么书可买。我们去了。当时重印古籍还很少，线装书又太贵，非我辈所可问津。他似乎身体有些不适，转了一下，我们就来到和平门外大街的一家餐馆。他坚持要吃清淡的菜，“鱼、肉没什么意思。最近胃口也不大好”。这时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不想在我家吃饭。他是喜欢我爱人做的南式馄饨的，而今天不愿意沾荤腥了。于是我叫了几个素菜，他也没有吃多少。此后很长时间，我一直以没有好好款待他而自责；待他病重我才明白，他的食欲那时可能已经受到肝胆欠佳的影响；于是我又因是他来看我而不是我去看他、我居然还陪他逛什么琉璃厂而后悔。

1982年夏天，他和祝鸿熹先生的几个学生，包括王云路、方一新等要毕业了，他要我去主持答辩。我去了。被邀请的还有华东师大的李玲璞先生。学生们论文的具体内容早就忘了，但总体风格近乎其师，这印象却是深刻的。在贻私下夸奖学生的话也还留在耳边：“这几个学生原来的基础并不怎么好，但是都很用功，进步很快，很不错。”现在这几位都已是著名教授，成就斐然，证明了在贻善于识人、教人。对于学生的论文，事先他并不置一辞，显然是出于公正之心完全要我们来评判。

那几天当然和他几乎朝夕不离。答辩之外的时间，游西湖，走十八涧。他特别欣赏湖心的阮公墩。“现在到处都是人，熙熙攘攘，没什么意思，那里人少，难得的清静。坐在亭子，——亭子、桌、椅都是竹子做的——泡上一壶好茶，一个人看书，或约几

个朋友聊聊天，很舒服。”过去我来西湖，并没注意到那个小小的圆形岛，当然也就从来没有上去过。经他一说，立刻有心痒的感觉。可惜那一次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船，没有去成。

事隔数年，忘记了为什么事我又到了杭州。阮公墩的事我早忘了，他却没忘：“咱们去阮公墩吧。”船还没到岸，就见几位宋装的“酒保”走过来迎接。随着他们进得亭子，果然亭、桌、椅一色竹制，古朴雅致，但是招待我们的却是着红裹绿的“古代丫鬟”。外皮虽“雅”，张口举止却俗，形成了实在不协调的味道。茶也一般。“我上次来还没变成这样。商业味太浓了，煞风景。”他的话音里似乎有几分歉意。一碗茶没喝完，他就又领我走了：“到黄龙洞去吧。离杭大也近。”黄龙洞又是另一番景象，山不高而秀，林不奇却茂，曲径盘桓，凉风习习。虽然门前也有抬游客的花轿之类不伦不类的服务项目，山门、园内也是满眼古装，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去处，人声和花花绿绿被隔在浓荫和山石的那边。这里的茶甚好，虽不及虎跑泉，也还清醇，轻轻一啜，馥香在口。“这里怎么样？我常一个人，带本书，要上一杯茶，在这里一坐就是半天。”在贻此时颇有几分得意。“你真是‘市中仙’。可惜我没有这份清福。”“北京没有这个条件，你也忙。我是除了读书，写几篇文章，什么事也做不来。”

我知道，他不喜涉足世务，故有是语；他所不喜欢的，只是那些是是非非，是烦琐的杂务。而对公众事业，例如对学会的事，他是热心的，只要不让他做那些杂务，总是尽心尽力。我在大连、唐文兄在苏州，都办过训诂学讲习班，每次请他去讲课，他从没有二话，对食宿的安排也从不计较。他之喜静，乃性格使然，有时离开闹市，躲进山隅“成一统”，大概就如同当年他在嘈杂的喇叭声中独自徜徉于古籍。

最不能让我忘怀的，是他两次住进医院的情形。他第一次大病，恰好我在身边——是在长沙纪念杨树达先生诞辰 100 周年的会上。我与他同一房间，后半夜，他突然腹痛，却不肯唤我，我平时睡觉很死，可能他也发出呻吟了吧，我竟浑然不知。待我醒来，始见其展转强忍之状，至今忆起犹令人胆裂心碎。幸亏附近即有医院，马上我与友生孙雍长等人把他送去，守候在旁，直到医生作出诊断。他患的是急性胆囊炎。

此时我后怕起来——听说急性胆囊炎如果耽搁了，是能要人命的。看着他那蜡黄的脸色，扭曲的面容，我只能默默地站在床头，第一次品尝了目睹亲朋的极度疼痛却束手无策的味道。他一再让我回到会上去，虽然我站在那里无济于事，但我还是不愿走开。医院的条件很一般，病房简陋，卫生情况也不让人放心。隔了一天，杭州大学派了人来照顾并接他回杭，大家才放下心来。待到 he 第二次住院，不得不做手术，我才知道他的胆囊炎的严重程度。我不能不为他在长沙时忍痛一夜的毅力而惊叹，同时也为我没有及时醒来而自咎。

他第二次住院时我正在复旦大学讲学。我带着几个学生赶到杭州去看他。当时他因胆囊炎引发腹膜炎动了手术。看来恢复得不错，面色已经有些红润。据他说只是体力还不及以前。我们在病房里畅快地聊，又陪他在医院附近散步。怕他过分劳累，未敢久留。我是心里装满西湖上空灿烂的阳光向他告辞的——病根除掉了，从此在贻会健壮起来。朋友们也都以为在贻的病在胆，不料夺去他生命的竟是肝癌；我更没有料到在浙江医院的一握竟成永别。

在贻去了，从此中国语言学界少了一位饱学严谨、深邃卓犖的学者，我则少了一世难遇的挚友和诤友。说来也巧，他和我们的太老师黄侃(季刚)先生都是只差一瞬将满 50 岁时捐弃馆舍的。50，这是多么宝贵的年龄啊！难道真的“文章憎命达”，杰出的才人都应该在壮志将酬的最佳时刻撒手而去吗？“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苍天何其无义也！

在我家的窗台上，有一个盆景。几块江南虎皮石并立，错落有致。几次搬家，许多笨重的东西都丢弃了，惟有这个盆景，一直随我左右。底盆并不好，是水磨石的，若是现在，玩盆景的早已不屑一顾，可是 20 年前这在北京却很难觅。后来有人劝我换个好一点的盆，我不听。——这是在贻送给我的呀。

那是个夏天，在贻来北京了，从机场直接来到我家。一进门，就见他手里提着一个大纸盒子，重重的，打开来，就是这个盆景。我提一提，总有十来斤吧。我说：“提

这么重的东西来干嘛?你身体又不好。”“送给你的。为你准备了一盆兰花，没养好，没有带来。你不是很喜欢盆景吗?这是虎皮石的，最好。”这时我想起，有一次我到他家，进到书房，除了排放得整整齐齐的满架书、书桌上同样整齐的笔墨纸砚(他写信写稿都用毛笔)、光可鉴人的地面让我赞叹外，尤其引我注意的是书架上的一盆兰花和窗台上的一个盆景。我平时并不好此道，但兰花那柔长的碧叶和即将开放的花瓣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那盆景呢，几块石头，——和现在他带来的几乎一样——环绕着一汪清水，石上长满了青苔，犹如人迹罕至的深山峭壁；石缝间钻出一株“古木”，虬蟠苍劲。不知怎么，我突然觉得这两样小东西就是在贻性格的写照，而也只有像他这样沉静、丰富、内向的人才配得上这花，这山。“郭兄，你还有这个雅兴?”“看书看累了，看看这玩意儿，可以放松放松。”他看我对那盆景比较注意，就介绍说：“这不能晒，长出青苔才有意思。”这事已经过去一两年，没有想到，他竟然记在心里，又居然不怕重，从外面提回家，又从西湖边抱到北京来。我也曾学他的样子每天浇些水，但无奈北京太干燥，水太“硬”，不但没有长出青苔，反而在石上留下了一道道水垢的痕迹，江南的秀水青山变成了北国的干池秃岭。我虽然不能像在贻那样以此寄山林之想，但却视同家珍，“时时勤拂拭，不使有尘埃”。所谓睹物思人，此之谓乎？

为失去在贻这样的朋友之所以如此伤心，除了个人之间的情谊，还因为在我看来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他小我两岁，我们都是“长在红旗下”；我们的苦乐，总是与共和国的命运相伴，从50年代起，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可能是因为研究古代文献，传统优秀文化在他身上体现得极为充分：对学问执着，对友人诚笃，对名利淡漠。他幼时家境甚苦，弟兄几人只有他能靠着优异的成绩读上大学。大概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吧，所以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体质单薄。有时候我想，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挺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因此，我既惊诧和佩服他的勤奋博览、文思如涌，以至每当我有所倦怠，一想起他，就如受鞭笞，不敢少懈，同时又时刻为他的羸弱而担心，总是劝他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悠着点儿。在贻去世已13年，而我还健康地活着，这或许就是我不勤的证明吧，纪念在贻，令我赧然。

他常跟我说，他现在的成绩，主要是靠“文革”十年打下的功底。那时外边大喇叭哇啦哇啦叫，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真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文献书”。别人打派仗，他打“冷仗”、“硬仗”。现在环境好了，他还是觉得读的书少，“作学问，不读书怎么行呢？”我知道，他这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在他看了某些空洞无物、卖弄术语的文章，就说：“这人本事真大，不读书也能写得洋洋洒洒。我读不懂，也写不来。”

在贻的去世，让语言学界中同龄人震惊，让老一辈惋惜，识与不识都有无法言喻的哀痛。记得噩耗传来，我适在香港，是爱人打来电话通知我的。我当即与娜祺嫂通了电话，她那边泣不成声，我这边也只有哽咽，脑中一片空白，实在找不出什么语言能够安慰她、安慰我自己。但我想，在贻没有浪费在生之年的每一天，他心里装着的，只是学问、师友和家人，他充实的一生，体现在他闪光的著作，连同这本文集里，这既是对我这样的朋友，更是对娜祺嫂最好的纪念和安慰了。

在贻安葬时，我因为正在美国访问，连最后送他一程也没能如愿。以后又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未能到他墓前奉上一束鲜花——我想要献，就该献兰花。应娜祺嫂之命，我为他写了墓碑。我多想在那小小的石版上细细地镌上他平凡而光辉的一生啊，但是字数是规定好了的，实在不能尽意。听说墓地就在离西湖不远的群山中，很清静，虽远离他的家乡山东，但是却在妻儿和他用心血培育的学生们身边，阮公墩、黄龙洞近在咫尺，或许那里正是他安歇的好地方吧。

我常想，如果假之以年，在贻的成就，他为训诂学所做的贡献，当无法限量，远非这本他在短暂的十年中留下的文集所能容纳。但是，现在他的弟子们均已学术有成，而且都在严守着师门严谨朴实而又不断创新之风。因此，在姜亮夫、蒋礼鸿两位先师导夫先路之后，经在贻传递薪火，杭大——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在敦煌学、近代俗语词和俗文字研究领域已成海内外重镇。在贻的这一贡献之大，恐怕是他自己所未能始料的。

在贻文集的出版，证明学界没有忘记他，学生们没有忘记他，出版家没有忘记他。

是的，像他这样的学者，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学术发展的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但愿我的这些零碎的回忆能有助于勾起知之者的记忆，也使未知之而读到此书的后来人了解一些他的为人。

忝为序。

2002年2月19日于厦门

《郭在贻文集》前言

张涌泉 王云路 方一新

—

郭在贻先生(1939—1989)，号旻龠(又作旻庵)居士，室名朴学斋、仪二王斋(“二王”指王念孙、王引之)、冷凳斋。1939年1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碑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先后就读于当地小学和张店市初级中学、济南市第三中学，讷言敏行，沉静好学，成绩优秀，而尤以语文为最。1957年至1961年就读于浙江师院(1958年改名为杭州大学)中文系。因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分配在语言文学研究室，给姜亮夫先生当助手，至1965年秋季四清运动止。“文革”后调中文系任教。1979年被评为讲师，1980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他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核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他是浙江省第六届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生前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委员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1989年1月10日因病逝世，年仅50岁。

先生毕生致力于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训诂学、敦煌学、楚辞学诸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大学毕业后，在姜老的引导下，先生没有急于述作，而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当时他读书的重点是语言文字学，旁及历史、哲学、文学，其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他专攻的对象。后来先生回忆说：“清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我从头到尾读过三

四遍。我在自己用的本子上，先用朱笔点读过一遍，然后又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浮签，用一句套话来说，可谓‘丹黄烂然’了。”（《回顾我的读书生活》）这段时间的读书生活，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而又宽博的基础。他的处女作是1978年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上的《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研究》等五篇系列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说文》段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十年“文革”，举国板荡，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安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先生凭着对学术的执着追求，超然物外，仍一意沉潜于书卷之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读书生活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博览群书打基础转而进行专门性的研究。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楚辞》。自东汉王逸《楚辞注》而下，前人对《楚辞》已进行了反复深入的研究，有关的著述不下数百种，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明，谈何容易！但先生没有在困难面前却步。在研读了数以百计的《楚辞》论著的基础上，他凭着扎实的古汉语和古文献方面的功底，精思博辨，写成了《楚辞解诂》一文，对《楚辞》中的一些聚讼纷坛、向无定论的疑难词语进行了类似破译密码的考释工作。如考证“九约”即“纠钮”，“志度”即“扞”，“雷渊”即“回渊”等等，莫不洞见幽微，得其本真。他还写了《近六十年来的楚辞研究》、《楚辞要籍述评》等论文，对《楚辞》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宏观的评述。文章论述全面、评议得当，反映出一位深有造诣的研究者的真知灼见。此外，他还写了《〈汉书〉札记》、《〈论衡〉札记》、《古汉语词义札记》等论文，对《史记》、《汉书》、《论衡》中的一些疑难词语进行了考释，亦皆精审，多发人所未发。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先生的学术活动也跨入了新的阶段。在蒋礼鸿先生的影响熏陶下，他的学术研究从传统的训诂学领域转向了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从汉代经师到清代鸿儒，传统的训诂学在先秦两汉典籍的训释方面无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对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工作，却不曾很好地做过。这是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是文字训诂之学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从1979年在《中国语文》刊发《古汉语词义札记（二）》一文开始，先生继踵张相与

蒋礼鸿诸前辈之后，对汉魏六朝以来文献中的大量“字面生僻而义晦”或“字面普通而义别”的方俗语词进行了考释，先后发表的有关论文多达四十余篇。这些论文，思致绵密，征引详瞻，结论多可信从。诸如杜甫《彭衙行》的“咬”字，白居易《琵琶行》的“滩”字，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何许人”，长期以来以讹传讹，未得确诂，一经先生点破，便有雾解冰释之妙。在俗语词研究中，先生既汲取了前辈学者经常使用的归纳类比的训释方法，又善于把俗语词研究和文字校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如他考释王梵志诗中的“蛆協”一词，便是从文字校勘入手，指出“蛆”即“怙”的假借字，而“協”则即“妒”的俗体字，破除了字形的迷障，“蛆協”的意义也就豁然开解了。先生还善于将俗语词考释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追本溯源，求其会通。他非常注意观察那些较为特殊的语言现象，努力探寻并揭示那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如《唐诗中的反训词》、《杜诗异文释例》、《唐诗异文释例》诸文，都是如此。为了促进俗语词研究工作的开展，先生还从理论上对俗语词研究的特点与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先后写了《俗语词研究与古籍整理》、《俗语词研究概述》等论文。在1986年出版的《训诂学》一书中，更把汉魏六朝以来的方俗语词研究辟为专章，就俗语词研究的意义、历史和现状、材料、方法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填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日本学者佐藤晴彦教授指出：“郭在贻氏前年出版的《训诂丛稿》，以其踏实的工作方法而引人注目。这次的《训诂学》也是非常独特的。直截了当地提出俗语词问题并辟为一章，通过丰富的例证来强调说明俗语词的研究成果对于正确地理解文句是多么的重要，恐怕还是从本书开始的吧。在传统的色彩极其浓厚的训诂学的世界里，只有郭著这样说并且付诸实践，这是很不简单的啊！”（见《日本中国学会报》39集）

训诂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旧的训诂学作为经学的附庸，其主要目的是为经学服务的。过去的一些训诂学著作也往往言必称九经三传，摆脱不开为经学服务的老框子。所以如何加强训诂学的实用性，是摆在今天的训诂学家面前的一大任务。先生在训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十分注重训诂的实用性，撰写了《训诂学与语文教学》、《训诂学与辞书编纂》、《漫谈古书的注释》等一系列论文，努力使艰深的训诂之学同古籍整

理、辞书编纂，以及大中学校的语文教学挂起钩来。在《训诂学》一书中，“实用性”更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书中所揭示的训诂学的作用，极具说服力；所概括的训诂方法，又切实可行。现在许多高等学校把郭著《训诂学》作为教材，良非偶然。

八十年代初，先生开始把研攻的重点放到敦煌文献语言文字的研究上来。敦煌遗书的发现，改变了整个中国学术史的面貌，也为方俗语词的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敦煌遗书中的变文、曲子词、白话诗、券契等文书，保存着大量的口语资料，它们对于考察宋元白话之沿溯，对于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1959年，蒋礼鸿先生出版了他的名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考释了一大批变文中的方俗语词。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解决的问题仍复不少，而且蒋书只限于变文，考释的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和必要。所以在从传统的训诂学领域转向俗语词研究的同时，先生注意到了敦煌的俗文学作品，并先后发表了《唐代白话诗释词》、《王梵志诗校释拾补》、《敦煌变文校勘拾遗》、《王梵志诗汇校》等一系列论文。在敦煌文献方俗语词考释的过程中，先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敦煌俗文学作品的作者或抄写者，多数水平不高，写本中字形讹误很多，这些作品中丰富的方俗语词往往是通过俗字别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一些前辈学者在整理敦煌遗书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对俗字、俗语词给予足够的注意，整理工作中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疏漏，从而也对方俗语词考释工作的准确性带来严重的影响；敦煌文献中的俗语词研究要取得长足的进展，必须从俗字研究和文书校理入手。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从1987年开始，先生和他的学生张涌泉、黄征合作，开始了“敦煌学三书”（即《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吐鲁番俗字典》）的撰著工作。1989年底，“三书”的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大致定稿。该书依据敦煌写本原卷，校正了《敦煌变文集》的大量校录错误。以俗治俗，注重俗字、俗语词之考释，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此稿专谈我们自己的看法，自信不无发明，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尤多独得之秘。”确非自夸之语。

先生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原则，每

立一义，必胪举大量本证、旁证，穷源竟委，不为空疏皮傅之说。在《回顾我的读书生活》一文中，先生把自己的治学经验归纳为四点：一、读书要博，研究要精。他认为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中外古今文史哲，都要涉猎一些，这对于提高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大有益处。但对研究工作来说，则必须专精，切忌博杂；做学问要注意根柢之学。比如搞训诂的，对几种小学名著，必须扎扎实实地精读一二种，然后由点及面，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推广开去。二、方法要讲究，学风更重要。他大力倡导去华崇实的学风，提出“务平实、忌好奇，重证据、戒臆断，宁阙疑、勿强解”的训诂态度，并且身体力行。三、做学问要重创造，贵发明。他崇尚清代皖派学者的发明创造精神，反对粗制滥造、雷同剿袭。他写《楚辞解诂》一文，先后凡七易其稿，参考的书有近百种，历时近十载，而所得不过一篇万把字的论文，其由即在乎此。四、做学问要刊落声华，甘于寂寞。他认为读书人既要耐得起苦，能于枯寂落寞之中得其真味和乐趣，又要自觉抵御外界名与利的诱惑，始终忠实于学术，献身于学术。正是以“甘于寂寞”自励，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为座右铭，所以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他仍能闭门读书，潜心著述，诚可谓“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姜老为先生手书《桔颂》语）。

先生在训诂学、敦煌学、楚辞学诸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推崇和瞩目。香港《大公报》两度载文评价赞誉《训诂丛稿》，《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语文导报》等报刊也多次载文介绍他的研究成果。他主持撰著的《敦煌变文集校议》获北京大学第四届王力语言学奖；他的论文《楚辞解诂》、《唐代白话诗释词》获中国社科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训诂丛稿》一书获浙江省高校文科科研成果特等奖；有关说文学、敦煌学、训诂学的论著连续三次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无愧于“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崇高荣誉。

先生为人谦虚谨慎，待人热情坦诚；他不慕荣利，一生清贫。先生手书压在书房台板底下的“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语出《南史》），正是他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先生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不但每学期为未来的博士、硕士、学士

们上课，为他们审阅论文、批改作业，还不辞辛劳地亲赴地县为函授学员讲课，满腔热情地为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青年朋友看稿审稿。为教学、为科研，先生竭尽了毕生的精力。

1989年1月10日，癌细胞夺去先生年轻的生命。他走得那样匆忙，他没能过上五十周岁的生日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二

2001年1月是先生去世十二周年，为缅怀先生的学术成就，并使之发扬光大，我们决定整理编辑《郭在贻文集》。整理编辑工作由张涌泉、王云路、方一新总负责。经过近一年的辛劳，《文集》终克告成。现把各相关著作及其整理情况说明如下：

《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书是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收录了先生从1961年工作以来，主要是1977到1983年期间撰写的训诂学方面的三十多篇论文。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早期治学的主要方向：楚辞之学，这就是本书前面的《楚辞解詁》（初稿亦名《楚辞新笺》）等论文；《说文》之学，先生曾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熟读多遍，撰成《说文段注评述》，约十万字，主要部分就是收录在本书后面有关说文段注的五篇论文；俗语词研究，主要是唐宋俗语词以及汉魏六朝专书语词的考释，中间多数论文属于这一方面。前两类是先生早年，包括“文革”期间精心钻研的内容，后一方面先生后来主要致力的研究内容。

本书出版后，先生不断修改，曾在两个自补本中加上了许多眉批和例证，也有修改纠误之处。在一部自补本的扉页上，先生用朱笔恭恭敬敬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书中红笔字有一部分为蒋礼鸿师所批。”蒋先生曾将此书从头至尾看过一遍，写了不少批语。根据蒋先生及其他先生的意见，先生也有所补正。此次整理，据以进行了若干修订，并加进了大部分例证。

本书的整理校对工作由王云路负责，硕士生王兴水协助核对和摘录了部分例证。

《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学三书”之一，与张涌泉、黄征合撰，岳麓书社1991年版。“敦煌学三书”是先生生前主持编纂的系列著作。可惜本书方始告竣，先生便赍

志以殁了。《敦煌变文集》是王重民、王庆菽等编辑的一部变文总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在校录方面疏误颇多。以往的学者在校勘变文时，因条件所限，多用理校，虽有创获，但郢书燕说的地方也不在少数。本书在逐篇逐句核对敦煌变文原卷（缩微胶卷）的基础上，对该书的疏误进行了系统清理，并纠正了后人的大量误校。

本书前半部分的校对工作由黄征负责，后半部分的校对工作由张涌泉负责。因黄征远在南京，所以张涌泉也承担了前半部分的初校和最后的核红工作。考虑到《郭在贻文集》各分册之间篇幅的大致平衡，这次付排时本书内容略有删节。

《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本书是先生继《训诂丛稿》后完成的又一部力作。先生在本书《后记》中，曾提到写作时念念不忘的有两件事：一是要有独创性，二是要有实用性。而本书的主要成就和特色，也正在于此。书中所举例证，大多出自作者个人心得，体现了“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精神，足以启迪后学。书末附列训诂学和俗语词两种参考文献要目，介绍论著千余种，并以夹行小注的形式钩玄提要，多点睛之笔。

本书出版后，先生一直从事修订增补工作，对正文和附录都作了增补，分别记在三本自存的《训诂学》里。正文方面多数只是增加一两条书证，较难插补，故此次整理未予补入。原版有一些笔误或排校失误，有的地方先生已经在自存本上作了改正；四川大学张永言先生得知我们在编辑整理先生文集，特意寄上他在读郭著《训诂学》时随手记下的疏误（主要是误字）之处，凡数十条，师辈的真情厚谊，着实令人感动。此次整理时，据以作了一些修订。

先生对书末的两个附录有较多的增补，特别是《俗语词研究参考文献要目》，是陆续重新编次的，“凡五易其稿”（手稿附录前按语）。这次整理时即据先生手写“征求意见稿”逐录，并改正了若干笔误。

本书的整理校对工作由方一新负责，博士生胡晓华也做了很多工作。

《旻龠文存》包括上、中、下三编。“旻龠文存”是先生为他自己早年所写的一些

论文编辑时所用的名字。这次我们把它当作先生《训诂丛稿》等上述三部专著以外的所有遗稿（包括论文、序、诗、书信、读书胜录等）的总名。先生生前在编辑论文目录时还用过《训诂丛稿续编》的名称，但考虑到这个书名无法容纳训诂学之外的内容，所以这次编辑时没有采纳。凡是没有正式发表过的遗稿皆于卷首目录篇名右侧注“ ”形符号以为标识。

《旻龠文存》上编主要收录语言文字方面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多数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后来又曾收入由张涌泉、黄征编辑的《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和《郭在贻敦煌学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两书中，只有少数几篇是我们根据遗稿整理的。这些文章的内容包括字词考释、训诂札记、敦煌文献校勘等几个方面。

《旻龠文存》中编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1. 《黄生 义府 正误》以下九篇为读书札记性质，係先生对所读书随手所作的补正笔记，其中有些匡补意见已提请原作者参考（如《义府续貂 补例》）。这些文章是我们根据遗稿整理的，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

2. 《继承朴学家的优良传统—— 义府续貂 评介》以下十篇为书评和序，多数已经发表过。

3. 《近七十年来的楚辞研究》以下五篇为楚辞学和李贺诗歌的语言艺术研究，其中《屈原研究三议》是第一次发表。最后一篇《说文研究专题教学大纲》是先生给研究生讲课用的提纲，这个提纲曾分送学术界朋友征求意见，颇得好评。

《旻龠文存》下编包括：

1. 《读书胜录》及其续编。《读书胜录》原稿按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 14 条为训诂札记性质；后一部分 80 条为杂录性质，每条一个主题，摘录前贤的嘉言懿行，并加以简要的评说。二者似不相属。兹把前一部分从《读书胜录》中抽出，移入《旻龠文存》上编的《训诂札记》中。《读书胜录续编》分“考订琐记”、“治学粹语”、“艺苑玉屑”、“史林杂俎”、“谈苑碎金”五部分，係分门别类辑录前人有关成说。

2. 《函札存稿》及附录《友朋函札选录》。1988年夏秋之交，先生曾把给友朋的21通书信（主要为1988年所写）的底稿请人誊录结集为《函札存稿》第一集，并在较为费解的字句旁加上小圆圈，说“拟加注解”。另外先生在给他大哥的信中曾提到想把一些专家的书信汇集起来“編一個書信集子”。按照先生的遗愿，我们收集编辑了《函札存稿》及《友朋函札选录》。为了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先生治学、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把所能征集到的所有先生的书信都收入了《函札存稿》，共计收录给70位友朋的248封信件。征集工作得到了学术界师长们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但由于时间匆促及其他一些原因，收入本书的仅仅是先生生前所写书信的一小部分（先生自己曾有过统计，仅1987年一年就发信297封）。我们期待着师友们的继续支持，以便为将来编辑一部更为齐全的《郭在贻往来书信集》做好准备。至于友朋来函，先生生前颇为注意保存，但也有部分书信尚未见到，加上时间和出版经费的限制，我们只选录了50位先生的187封来信。所收书信基本按原样收录，但有若干书信因牵涉人事，略有删节（皆在每封信下注明）。由于写信人的风格不同，各人在书信中对尊称、谦称的处理方式也略有区别，为排版的方便，尊称时的空格或提行一皆改为接排，原信中谦称如用小字则排版时亦仍酌用小一号的字以示区别。所收书信按收信人或发信人姓名的音序排列，同一收信人或发信人的书信再按写信日期为序。由于有的来信只署月日而无写信的年份，而信封又多未保存，这就给确定具体的写信年份带来了困难。其中有一部分来信先生当年在信末的月日前添注了年份，这种年份我们用〔〕号括出；还有一些信的年份是我们根据内容推定的，则用（）号括出。凡年份不详者殿后。给一些书信酌加“注解”，当然也是我们的心愿，然而同样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双重限制，这个工作也只能俟诸异日了。

3. 《旻鑫诗钞》。先生喜欢古典诗词。李商隐的《无题》诗、黄仲则的《绮怀诗》、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都曾使他如痴如醉。先生早年（大学毕业后的四五年）曾写过一些旧体诗。他在1976年5月编的《著述目》中列有《旻鑫诗钞》，但注明“佚”。这次我们在他的遗稿中检出八首，其中的七首曾在“庚申（1980）中秋”寄请浙江古籍

出版社编审吴战壘先生“祭政”。这些诗，虽多为仿效李、黄、龚之作，先生自己似乎也不很满意，并曾说要“拉杂摧烧之”，但它们同样反映了先生学术研究外的另一个侧面，故仍收入集中。

4.《治学漫谈》、《回顾我的读书生活》、《自订年谱》。这是一组自述生平经历和治学方法的文稿。其中《自订年谱》为手稿，记事止于1986年元月22日，这一天先生因心脏病住院后出院，云“此段时间为余生平最苦闷之日”，年谱盖即作于此时。

《旻龠文存》的搜集整理校对工作主要由张涌泉负责，其中王云路承担了《友朋函札选录》的主要校对工作，浙江教育出版社王翼奇编审审读了《友朋函札选录》所收的大部分书信的校样，关长龙副教授及博士研究生叶贵良承担了《函札存稿》的初录工作，博士后江学旺承担了《旻龠文存》上、中编部分论文的初校工作，叶贵良协助核对了部分引文。

整理先生往来书信和序言，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先生对朋友对后学的那种诚挚的关切之情。无论是同辈朋友还是晚辈后学，当他们发表论著、联系工作请求先生帮助的时候，先生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甚至在弥留之际，先生仍牵挂着他的学生（先生的绝笔是“缠绵病榻”之际用颤抖的手为硕士研究生关长龙写的联系工作函）。在这些书信和序言中，笔底含情，语多褒扬，甚或不乏“溢美”之词，先生的“菩萨心肠”展现无余。对此，我们自己是深有体会的。在深深地感激老师的同时，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当之无愧，并不认为自己取得了什么了不起的成绩，而只是把老师的鼓励之词当作一种鞭策，当作继续努力的目标。

附录 附录一是许嘉璐先生1990年写的郭在贻教授墓志铭。附录二郭在贻教授论著目录由张涌泉编制；附录三《郭在贻文集》索引由王兴水编制。

本书用繁体字排版，文字一般用新字形和规范繁体字，但因书中也包括古籍整理等内容，所以有时也酌用旧字形和若干异体字，以使其中古籍引文和作者论述的用字保持一致。卷数用中文，作第十一卷或卷一一、卷十一，不作卷11；页数、年份一般用阿拉伯数字。但鉴于所收论著写作时间长达数十年，为尊重历史原貌，本次结集时

不强求一律。

《郭在贻文集》的整理工作得到了许多前辈学者的关心和支持，德高望重的启功先生惠予题签，许嘉璐副委员长在百忙中为本书撰写序言；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评委会给予部分出版资助，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也给予了关心和帮助；一向以繁荣学术为己任的中华书局慨然接受了本书的出版任务，责任编辑李解民、李晨光先生尽职尽责：在此一併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受业 张涌泉、王云路、方一新谨记

壬午年正月